



汪 熙 杨小佛主编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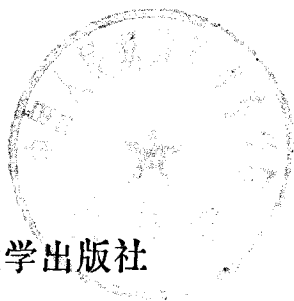
Z67772



2 020 7456 6

陈翰笙文集

汪熙 杨小佛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翰笙在书房与来访者交谈



陈翰笙在英语教学班

開伯尔山口之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印度史学会在
白沙瓦開年會。予時德里大學史學
系主任冠希教授同出席。會後
同遊阿旁汗邊境開伯尔山口。在
山口由乘火車一小時。次日作古
作一首。

陸行鐵軌似長蛇，
轟轟列車近朝霞。
一片蒼翠奪我目，
幾陣香襲是野花。
流水潺潺急如呼，
丘陵疊疊無坦途。

此去迫近喀布尔，
林鳥亦唱普什圖。
八十年前稱險隘，
英俄對峙分勝敗。
為防南下哥薩克，
五里一庫儲軍械。
埋彈如甕存庫前，
備創敵人山口邊。
於今火箭飛萬里，
俯笑地雷今長眠。

1945年12月21日。

卧佛寺前

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因参加革命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被军阀张作霖枪斃。
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东溝村。一九六〇年
十月二十三日我去掃墓。適值天陰，一片秋景引
人入迷。追念友人，口占七絕一首。

景色朦朧記憶新，
平生友好無多人。
西山佛寺仁山墓，
不入關黎自有因。

60年10月23日。

前 言

(一)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著名学者。他的著作至今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他又是一个积极投身于革命的革命家。现代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如反军阀的运动，反国民党政府的保卫民主运动，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等等，都是同他的名字有联系的。陈翰笙曾先后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执教，他是一个热爱青年、哺育后进的革命前辈和博学长者。他永远都是那样平易近人，千百个受过他熏陶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质朴谦逊、谆谆善诱的风度所感动。一直到今天，虽已年近九十，目力衰退，但仍然不辞劳苦地把设帐教学、哺育青年看成是他应尽的责任。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陈翰笙走过的道路是一条不平凡的曲折路程。

1897年2月5日陈翰笙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假使说在幼年时期母亲的品德教育使他懂得要做刚正不阿的人；那末，青年时期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时的历史教员傅荣湘（南社诗人，同盟会会员）则是他思想上的启蒙人。傅老师为学生们慷慨陈述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列强的欺凌压迫，使国家沉沦，人民遭殃，整个中华民族都蒙受羞辱。讲到伤心激昂处，傅荣湘不禁声泪俱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国耻！国耻！使青年陈翰笙在心灵上受到极大震动。立志献身救国成了他未来事业的出发点。十八岁的那一年（1915

年),科学救国的思想浪潮把他带到美国。母亲变卖首饰仅够支付旅费,到美国后只得搞勤工俭学,边做工边学习。如饥似渴地追求科学知识的陈翰笙先在加州的波莫纳大学学习植物,因视力不好,看不清显微镜下的物体,遇到困难;改学地质,又限于眼力,在野外作业观察不清,画不好地形图和地质图,难有成就。正当陈翰笙苦闷彷徨之际,历史系教授韦斯脱卡特看中了他的英语水平,建议他改学历史,并协助评定学生作业。本来对历史就有特殊癖好的陈翰笙欣然改学历史。为了主修欧美历史,他学习了德文和法文。又工作又学习的学生生活是够劳累的,但是精力充沛的陈翰笙仍然积极投身于校园的学生活动,三年级时被选为学生会会刊《学生生活》的编辑委员。1920年陈翰笙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波莫纳大学。在韦斯脱卡特教授的推荐下,他进了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并取得了奖学金。这时,1917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到1920年秋已有定局。俄国为什么发生革命,成了当时在美国的许多先进分子思索的问题。要了解俄国和十月革命,陈翰笙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了俄文,开始探索俄国的问题。1921年他以《中国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关系》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1921—1922年陈翰笙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东欧史。1922年春,陈翰笙同他新婚不久的夫人顾淑型到了欧洲。他在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两年后,他写出了博士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取得了博士学位。

1924年,二十七岁的陈翰笙回国应蔡元培的邀请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欧美史学史和美国宪法史。这时,中国的政局在发生剧烈的变化。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枪杀进步工人代表顾正红,英租界巡捕房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了,

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浪潮从黄浦江畔涌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的学生走出了教室，掀起了爱国示威运动。北京在沸腾，中国在震撼。就在这时，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陈翰笙结识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苏联教员格林涅维奇、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坎托洛维奇和大使加拉罕。在李大钊的介绍下，陈翰笙同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后又经加拉罕大使的介绍，他为第三国际的《国际通讯》写了不少英文通讯稿。中国的革命动态通过他的英文通讯，传播到海外。

1927—1928年陈翰笙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了一年。1928年返国后，经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聘任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协助他工作的有：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刘瑞生、孙冶方、秦柳方、姜君辰、石凯福（现名薛樵）和项世澄等。

1933年，陈翰笙决定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过去参加农村调查的一批同志的基础上，由陈翰笙和吴觉农、孙晓村、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冯和法、张锡昌、秦柳方、陈洪进、姜君辰、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狄超白、千家驹、张稼夫等在1933年发起组织有五百多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被推任为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引导了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中国革命。

1935年，陈翰笙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任特级教授。在莫斯科，由当时在第三国际负责东方工作的中国人给他办了由第三国际转到中国共产党的手续。

1936年开始，陈翰笙应美国太平洋学会之聘到美国，在纽约担任该会季刊《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历时三年。1939年5月，他在党的指示下回到香港。在香港编辑英文半月刊《远

东通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这个刊物用航空版最先向世界各地报道了真相，向全世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同时，在宋庆龄主持下，他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在香港发起组织“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任秘书。当时支持中国抗战的美、英、加、澳、新、菲律宾等国都设立了中国“工合”促进委员会，成为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个支援中国抗战的组织。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不断收到国际朋友和爱国华侨的捐款，由陈翰笙设法绕过国民党的控制，通过廖承志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

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转移到广西桂林。在桂林主持了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协助张锡昌创办《中国工业》月刊，并团结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4年春，国民党军委会从重庆密令桂林军委会办公厅秘密逮捕陈翰笙，桂林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出于对知名学者的尊重，通过陈此生转告了这一密电，陈翰笙夫妇在外国友人掩护下出走。随后从昆明乘上英国军用飞机直飞印度，这是他第三次流亡异国。

从那时起一直到1946年6月，陈翰笙一直在印度德里大学任评卷员，参加了印度全国史学会。在这期间，他冒着酷暑，几乎跑遍了印、巴、孟地区调查农村情况。1946年6月他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并利用在印度调查的材料参考卷帙浩繁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和其他资料，研究南亚的经济区域。成书后，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印度巴基斯坦经济区域》。英文版是印度1980年出版的《南亚农业区域》。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陈翰笙应周总理之召离开美国经欧洲回国。曾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

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同时创办了英文《中国建设》月刊，任编委副主任（宋庆龄任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世界史组主任。他以主要精力从事著述和研究，写了很多专著和学术论文。从1973—1978年，他主编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现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现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兼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南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和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主任。

（二）

本书收集的专著和文章共46篇。21篇是中国解放前写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25篇是解放后写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两类题材反映了两个时代的历史任务。46篇中有关帝国主义的文章共6篇，中国农村经济的13篇，外国农村经济的5篇，工业合作的文章4篇，论研究和教育工作的7篇；其余11篇是一些有关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当然，他的全部著作不止这么一些。可是，这几十篇专著和文章本身也足够说明作者自己的思想体系、治学方法和写作特色。

首先，陈翰笙长期以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解答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写历史著作而是解决现实问题。他认为现状是历史的延长。不了解历史不能真正理解现状，错误地了解历史就会错误地理解现状，也会错误地认识未来。解放前最迫切、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反帝反封建。所以他集中力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土地问题。从1929年到1933年这三年多的期间，他一方面研究世界封建

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进行实地调查，历史地、科学地了解现状。最终目的是建立我国土地革命的科学依据。革命实践是他思想体系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是解决研究对象问题。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阶级。中国的帝王将相、军阀地主，外国的财阀和人民，只要与革命事业有关，都作为社会阶级进行研究。但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社会阶级。他的研究不排除历史考证和统计数字，但以阶级变化为主，不沉溺于那些次要的研究方法。他写的文章里总有多种阶级的典型形象，而不是一些呆板的概念和程式。

他在解放前发表的文章不仅是亿万生灵的血泪控诉，也代表正义对封建主义的庄严宣判。

第三，注重实地调查。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饱学之士，但是在治学中，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为了解工人情况，他到工厂直接找工人调查；为了解农村的情况，他到农村直接找农民调查。他特别注意第一手的材料，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收集的材料，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结合理论加以分析，然后引出必要的结论。应该承认在三十年代，他带领一批同志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开创了我国学术界实地调查的一代学风。

第四，强调历史教育对人生观的积极作用。他一贯认为历史对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极端重要的。近年来，特别是致力于历史尤其是世界史的普及工作。除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外，不断呼吁要提高中小学历史教师的质量，要向青少年提供丰富的历史读物，他认为“面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提出了“通过学习外国历史，可以使广大青少年……掌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正确的人生观”的观点（见本书第494页）。可以说，这是他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

总结性的论点。

第五，在战斗中做学问。本书所收集的这些专著和文章是作者在政治动荡，战事频仍和激烈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写出来的。解放前，没有安静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革命的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困难更大，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根本谈不上系统研究。陈翰笙的著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惊人成就，他的著述与文章都是在反动派追捕和流亡异国的条件下的战果。他的阵地不断转移，能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战斗；在什么地方，就打什么地方的仗；能打多久，就打多久。他在二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后，就立即投入革命实践，敏锐地把握各阶级跳动的脉搏。尽管他同欧美派大学教授所支持的《现代评论》在观点和立场上都有分歧，但仍利用这个阵地发表几十篇文章，投出匕首。由于战斗与学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尽管题材不一律，内容核心只有一个，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而服务。细心的读者会看出，即使文章体裁不同，但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那就是上面所说的现实性、阶级性、生动性和教育性。他历来坚决反对盲目性、概念化和程式化。

第六，独特的文风。他的文章都短小精干，不说多余的话，不用多余字，不写没有创见的文章。例如，他1941年写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1911—1941)，(见本书第124页)，只用了五千多字就总结中国农村五个方面的变化。在论述地权集中、农民离散的一节中，指出军阀雇佣兵的来源是失地农民。在论述高利贷资本时，指出二十年代前后高利贷性质的差别。这说明他的文章篇幅虽小，却富有创见。又如，《发展工业合作社要面向广大乡镇》(见本书第213页)一文只有五百多字，但含义很广。细心阅读，可以看出他着重的是小城镇，通过合作经济可以使得农村多余劳动力就地就业，创造当地的商

品生产的居民点。他指出无数乡镇的合作经济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别的场合也指出过，我国不排除外资外援，但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积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从上述短文可以看出国内市场主要就是无数的乡镇。不难看出他的观点来源于渊博的经济史知识。

他的文章，往往是起笔不凡，一鸣惊人。文章的第一句就吸引了读者，使他非读下去不可。这个特点在英文文章里特别显著。他在1956年一篇报道渔业合作社的文章，第一句话是：Nearly a quarter of world fishing areas are in Chinese waters. 西方读者当然会被这句话打动了，禁不住要读下去。

他写文章不喜欢用专门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词汇，用非常具体的事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英文文章也是这样，爱用简单句型、单音节词汇，考究音节响亮。还要求观点明确，逻辑严密，不允许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他的文章富有感情，但不依靠感情的形容词或副词。例如，《难民的东北流亡》全篇是血泪控诉，但没有情感的词句。可以说在朴素中见真情。又如，《物价与中农》（本书第134页）中，提到富农买进少女充当田役，身价有时低于牛价，劣绅也做人贩生意。寥寥数语，道尽人民的辛酸。

这几十篇文章，既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有优美的文笔，还洋溢着崇高的人民感情，也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三）

几十年来，陈翰笙同志写下的中英文专著和论文不下200余本（篇），要把它们汇编成一本文集，时间跨度比较大，再以历经动乱年月，他对自己的著述都没有保存记录。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找遍了国内外主要图书馆，最后才选编成这个

集子。为了使读者能对他的著作有一个较全貌的了解，书后附有陈翰笙同志的全部著作目录索引。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陈翰笙同志的学生和朋友们的热情支持，主动代为搜寻、复制，出了不少的力气。陈洪进同志还参与写了前言中关于陈翰笙同志学术评述的部分。在此我们谨致谢意。参加这本集子编辑工作的还有王邦宪、丁利刚同志。

陈翰笙同志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在品德上是一代师表。我们谨以这本集子作为向他的九十大庆的献礼，祝陈翰笙同志健康、长寿，战斗不息！

编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 (1928年)	1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1930年)	31
中国的农村研究 (1931年)	43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1933年)	47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摘录)(1934年)	73
中国“模范省”的乐土 (1936年)	99
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摘录)(1939年)	110
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 (1941年)	124
物价与中农 (1942年)	134
中国农民 (1945年)	137
“猪仔”出洋 (1979年)	154
不能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 (1982年)	163
农业改革促进了生产 (1983年)	165
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 (1940年)	168
目前工合的困难问题 (1943年)	171
合工：中国合作社史话 (1947年)	176
发展工业合作社要面向广大乡镇 (1984年)	213
陈翰笙致张锡昌同志函 (1944年6月25日)	214
五十年来印度的史学界 (1952年)	219